

# 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机制

杨松才<sup>1</sup>,张 芳<sup>2</sup>

(1.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4121;

2.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4121)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其价值追求,在理论构建上成功完成了生态范式的革新。这一理论突破具体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解”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由此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全新理念。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一套以民众生活需求为根本出发点、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为核心原则、以发展的永续性为长远目标的价值指引体系,开创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新维度,为既希望实现现代化,又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生态治理参考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人的全面发展;生命共同体;人类文明形态

**[作者简介]**杨松才(1997—),男,重庆人,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张芳(1987—),女,重庆人,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专职辅导员,助教,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文明教育、职业院校立德树人。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万州区2025年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贡献研究”(项目编号:WZKT2025013)。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202025>

**[中图分类号]** D61

**[本刊网址]** [www.oacj.net](http://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mailto:llyj2025@163.com)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谋划,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十五五时期在我国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意义。《建议》也明确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在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朝着更加绿色环保的方向前进,为全球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来自东方的开创性思路,引领人类文明形态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演进,全面开启生态治理的新征程。本文从学理层面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生态理念对全球生态文明发展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机制,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生态观,坚定道路自信,从而更好地“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 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属: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范式重构与理论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现代化,奠定了未来发展的总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中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对人的要求就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人始终是属于“物质性”的动物,完全不能离开物质世界。因此,中国走的现代化之路就是一直坚持着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点,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与人的自由程度越来越高环环相扣。

### (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解”思想的中国化承继

人类从出生起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指出,人类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改造客观世界,这种理念本质上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最佳和谐状态。“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然而,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为了积累财富和推动经济增长,人类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认为能够超越自然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预判了资本扩张者的心理变化趋势,他们指出“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必须同步实现,若只注重其一,便不

可能达到他们所构想的理想社会形态。而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正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本质,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最终目标,而“美好生活”就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必要条件,只有实现了“绿水青山”,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类才能从自然中解放与解放自然。所以,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让现代化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这样才能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自然物质基础,人与自然才能在发展中达到“和解”。

### (二)“生命共同体”理念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

在西方传统生态思想的发展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局面长期存在,成为生态理论研究的一大困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欲望无限放大,认为人可以完全主宰这个物质世界。资源的积累、生产力的发展比保护这个“物质世界”更加重要,因此资本主义的扩张历史充满了掠夺行为。然而,自然中心主义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把人类发展中“人类是自己的主人”这个事实抛弃掉,认为我们该以原始的方式不触碰自然,从而陷入了“为了保护而放弃发展”的误区,这种观念又难以满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需求。这种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认知方式,实际上是对人与自然内在统一性的人为割裂。而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恰好从本体论层面实现了对这种对立范式的根本突破。该理念清晰揭示出,人与自然并非处于主客对立、相互博弈的状态,而是个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人类要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滋养,自然系统的稳定平衡状态同样离不开人类合理且持久的守护。深入剖析这一理念的精髓可以发现,“生命共同体”不仅始终将人民的核心地位作为根本遵循,把保障民众的生存需求、发展机会与健康幸福作为生态保护工作的首要目标,同时也充分遵循了自然界自由发展的长期法则,将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设定为发展进程中必须遵循的准则,从而达成了“以人为本”与“尊重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有效突破了西方生态理论长期存在的认知局限,为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提供了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哲学分析框架。

### (三)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价值坐标系

当下,全球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正遭遇价值层面的深刻挑战。一方面,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幻不定、物种多样性不断减少、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等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但是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优先”发展理念下,很难凝聚起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全球共识,此外,发展中国家如何打破发达国家的控制瓶颈,是选择“牺牲环境”加快进程,还是蹄疾步稳,拉好人类发展与自然守护的“平衡线”,也是全球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秉持生态霸权主义,把环境议题政治化,实施双重标准,打着“生态保护”的旗帜,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显然违背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倡导的公平正义准则。而中国式现代化既守住了发展的底线,又实现了发展的提质增速,这种发展模式为一些看不到前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背景下,我国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重要发展理念,构建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全新价值体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兼具普适性与包容性的新价值坐标系。该价值体系在实践中展现出三个关键创新点:其一,它确立了以民众需求为根本的价值根基,将生态环境保护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两边抓的举措融会贯通,清晰阐释了优质生态环境是惠及大众的重要福祉;其二,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始终维护“责任与担当共建”这一全球治理原则,既积极履行生态义务,也坚决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发展权益,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责任放在肩上,为全球的生态治理不断贡献力量;其三,聚焦长久发展的价值追求,为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确立生态边界,鼓励发展中国家多发展清洁能源,不断讲好中国的“环保故事”,让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到共建共创中。这一价值体系与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态、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相契合,它并非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标榜的“普世价值”,而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汇聚了价值层面的共识,同时也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生态现代化实践的可复制机制

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成功探索出一条兼顾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其核心在于构建了一套系

统、协同、可持续的治理机制,为全球特别是面临类似转型挑战的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这些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 (一)顶层驱动的制度创新机制

由于生态治理具有系统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特点,所以它需要建立在一个稳定、完整且具有刚性的制度框架之上。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规划与战略部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生态要素的统筹协调与优化配置,要求必须“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这使得在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生态建设实践中,一套涵盖“高层协调、体系化构建、责任完整闭环、严格规范约束”的制度创新框架得以形成,有效解决了生态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推进、短期化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普遍性挑战。在顶层设计层面,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核心目标,从国家战略层面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核心工作,避免了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长期“两张皮”产生的不可补救问题。在制度体系构建层面,对《环境保护法》等数十部生态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完善,构建起覆盖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等各个领域的法治保障体系;在生态治理实践创新方面,我国率先推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机制,实施河长制管理模式,并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生态治理实现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的转变,推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快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在生态治理责任落实层面,构建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责任体系,借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达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常态化、全覆盖监督,把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之中,进而形成了生态治理的刚性责任闭环。

总之,这套“顶层统筹+系统制度+责任闭环”的核心逻辑,能够为全球各国,特别是那些面临生态治理各自为政问题的国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制度构建思路。

### (二)经济系统的绿色转型机制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改善的协同共进,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源头管控、过程升级、末端优化、创新驱动”的全链条经济绿色转

型机制,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的发展道路。

在产业转型的初始阶段,需以优化产业格局为关键,具体而言,要着重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项目的无序发展,同时推动传统高耗能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此外,还需将绿色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着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中国在光伏、风电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均占据全球领先的市场份额,这些产业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的提质增效,还显著助力了全球绿色能源成本的快速下滑。在此基础上,围绕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两大核心,积极推广前沿节能减碳技术,同时构建涵盖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机制,以此最大程度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打造了“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绿色技术革新机制,着力攻克了新能源、储能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与此同时,中国也健全并优化绿色金融相关机制,以此吸引各类社会投资力量,推动其资金流向绿色发展领域。

这一体系的关键意义在于打破了“绿色转型必然牺牲经济增长”的固有认知,为后发国家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直接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开辟了有效路径。

### (三)多元共治的社会行动机制

“人是创造主体和享受主体的统一”,个人的创造即可影响整个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必然面临“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一条“政府引导、企业主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社会行动机制,进而构建起全民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体系。

在政府引导层面,通过生态环境教育、绿色宣传引导等方式,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多元主体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在企业主责层面,构建企业生态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强化环境执法监管,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刚性约束;同时,通过绿色税收、环保信用评价等正向激励政策,引导企业从“被动合规”向“主动履责”转变。在社会协同层面,发挥环保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科研机构、高校等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开展环保公益活动、政策研究、技术服务、科普

宣传等工作,弥补政府与市场的治理空白。在公众参与层面,公众作为生态治理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通过参与环境决策、监督环境执法、践行绿色生活方式等途径,形成了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这套多元共治机制实现了生态治理从“政府单一管理”向“全社会协同治理”的转变,其权责清晰、渠道畅通、激励相容的核心逻辑,能够适配不同国家的社会治理结构,为全球生态治理落地见效提供了坚实的社会行动方案。

###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维度:全球协同发展的中国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不仅致力于建设本土的“美丽中国”,让生态环境更好地滋养人类,更以其超越性视野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形态贡献了东方智慧,为全球协同发展开辟了新的实践路径。

#### (一)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公共产品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把自身在建设里所积累的经验与智慧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公共产品”,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的治理方案。首先,在理论赋能方面,在面对全球生态治理集体行动所引发的困境下,中国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破了发展与保护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突破了西方主客二分哲学传统束缚,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议程提供了“天人合一”东方哲学理念的有力支撑。以“共生共荣”替代“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为全球生态合作构建了新的价值根基。其次是机制的输出,中国的“绿色丝绸之路”成为了全球公共产品的关键载体,这不仅推动着中国走向绿色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同时也帮助了发展中国家建设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并分享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生态红线管理的实践经验。这种“授人以渔”的合作,使发展中国家得以绕过“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陷阱,实现绿色发展的“蛙跳式”跃升。最后,以务实行动展现责任大国的形象。从“双碳”目标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到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与部署的前排国家。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全球生态治理的理念共识非常重要,在理念引领下的集体行动也很重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红利被当作公共产品供给,这一理解使中国式的现代化生态红利能转化为全球协同发展的共同财富。

(二)为发展中国家构建“绿色现代化”的可行路径提供参考依据

西方“殖民式”的发展逻辑从未真正消逝,他们在生态问题上表现出的虚伪性,正逐渐被世人看清。那些率先实现资本积累的发达国家,非常清楚如今的蓝天碧水,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把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抛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剥削,成为西方现代化难以洗刷的底色。与其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证明:一个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在工业化进程中同步开启绿色转型,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强度。中国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与最大清洁能源装备输出国,这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其发展方式并非奢侈品,并不是无法学习的,而是另一种“绿色现代化”的发展范式,让发展中国家不再受到“生态掠夺”。因此,当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政策以环保之名筑起贸易壁垒时,发展中国家常面临“保发展”与“减碳”的两难。中国主张“共同且有区别的责任”,反对“你们环保、我们污染”的不公正格局,避免了让最无力承担生态治理代价的国家去承担,是发展中国家可具体参考的实践依据。

#### (三)促进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态转向

当我们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放到更宏大的文明史视野里去考量,就会发现它的意义不只是解决某个具体的环境问题,而是参与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类文明该怎么走向?”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通过初次的工业革命加快了人类社会进程,但是也促使文明陷入自我迷失,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失去了新鲜空气和洁净水源,也失去了物种的多样性。这种“不自然”根源于对“人的现代化”的狭隘理解——当现代化被简化为“物的增值”,人便成了欲望的载体,自然也沦为了工具性的存在。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转向,努力把西方现代化里被撕裂的“人”和“自然”重新缝合起来,让“人的全面发展”重新被锚定在“人与自然的和解”之中。生态保护并非发展阻碍,而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其终极目标在于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此愿景里,人和自然并非主客之分,而是有机整体且相互相伴。国与国之间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同舟共济、彼此相依。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生态转向,恰是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

文明的一次重要探索。它不单是一条中国路线,更是一个全人类希望实现的“美好世界之景”。

####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领域的探索,并不是仅限于一国一时的发展策略,其本质上是对人类文明演进路径的一次深刻重构。本文的探讨表明,这种重构始于理论层面把人当作自然一部分又不拘泥于自然,达到和谐共生的平衡度,超越了西方主客二元定式思维,确立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归宿、以“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目标的生态范式。在实践层面,中国形成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借鉴性的系统。从制度设计的顶层设计到经济系统的绿色转型,再到社会层面的多元共治,这套机制的核心在于将理论上的生态思想转化为刚性的约束、自发的动力与集体的行动,从而有效破解了“发展与保护”的二元难题。正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国式现代化得以从全球视角贡献其智慧。它不仅通过提供理念、技术与制度等公共产品,丰富和推动了全球生态治理的议程,更重要的是,它以自己的成功实践,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可能性,那就是现代化并非依赖与掠夺的单一剧本,一条基于自身国情、坚持独立自主、统筹发展与保护的“绿色现代化”道路是切实可行的。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继续深化对这

一路径的内在逻辑与全球适配度的探索,让生态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1.
- [2]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1(14):4-14.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
- [6] 沈江平. 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J]. 人文杂志,2023(6):1-9.
- [7] 范斌旭. 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商业大学,2025.
- [8] 陈敏鹏,文皓薇. 全球多边环境治理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演变逻辑及趋势——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例[J]. 生态学报,2025,45(16):8253-8265.
- [9]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中国智慧[J]. 环境保护,2025,53(15):8.

###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Mechanism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Empower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ANG Song-cai<sup>1</sup>, ZHANG Fang<sup>2</sup>

- (1.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Safety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4121;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Safety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4121, China)

**Abstract:** Regard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s its value pursui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paradigm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is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s embodied i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Marxist thought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dualistic thinking mode, thus putting forward the new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life”. Based on such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rovides a value guidance system for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takes people’s living needs a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as the core princip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long-term goal. It has created a new dimension of the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offered a brand-new reference path for ecological governa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aspire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environment.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community of life;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